

【网络安全】

意识形态网络舆情的社会网络分析 ——以“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论战事件为例

洪小娟^{1,2}, 刘璐¹, 黄卫东^{1,2}, 叶美兰^{2,3}

1. 南京邮电大学 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2. 南京邮电大学 江苏现代信息服务业研究基地, 江苏 南京 210023
3. 盐城工学院 校长办公室, 江苏 盐城 224001

摘要:意识形态网络舆情是意识形态斗争向网络空间渗透的标志。以2015年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论战事件为例,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网络基本结构、节点中心性、块模型和子群结构四个方面对意识形态网络舆情的网络特性和传播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意识形态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具有明显的“意见领袖”特征,网络中存在具有明显等级关系的若干子群,且网络内部群体极化严重,极易成为孕育民粹主义的“网络温床”。

关键词:意识形态;网络舆情;社会网络分析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章编号:1673-5420(2017)03-0010-10

意识形态,即观念上层建筑,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思想^[1]。意识形态斗争是不同社会意识形态为争夺民众认同和生存空间而相互斗争的行为和过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当今社会思潮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发展态势。经济基础多样化、社会阶层多元化和文化开放与价值多元化的共同作用使得我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斗争日益尖锐^[2],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在推动信息时代到来的同时,更为意识形态斗争提供了新的平台与场所,使得意识形态斗争向网络空间渗透。

意识形态网络舆情是意识形态斗争向网络空间拓展的产物^[3],是网民基于现实社会经济形态及由其决定的政治制度的系统看法和见解,它体现了网民的思想,代表了网民的利益,并通过对网民行动的指导,反作用于现实社会。近年来,从屡屡出现的诸多舆情论战便可窥见一斑,网民意见的表达已经不

收稿日期:2017-05-25 本刊网址:<http://nysk.njupt.edu.cn>

作者简介:洪小娟,副教授,研究方向:网络舆情。

刘璐,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网络舆情。

黄卫东,教授,研究方向:网络舆情与应急管理。

叶美兰,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网络文化安全与管理。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个体情感模型的舆情传播机制研究”(71671093);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创新团队“网络文化安全与管理研究”建设项目(2013-011)

仅仅是其自我主张的陈述和自身情绪的宣泄,更是上升到了意识形态层面^[4],如某凉茶企业与某微博大V互动讽刺抗战英雄,山东爱国青年被打等舆情事件中所出现的高歌西方主义、否定我国社会体制、讽刺国家政权等极端意见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观点争鸣,而是升级为意识形态斗争。此类对国家政权和社会体制持消极甚至否定态度的意识形态在冲击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亦在逐渐影响着普通网民的思想与行为。若不给予重视,势必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产生消极影响。

目前,舆情的相关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研究内容等都为意识形态网络舆情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5],然而,依托移动互联网,并以意识形态为主题进行的舆情研究仍较为匮乏,对于意识形态状况的判断主要采用描述性判断(即模糊主观性判断)方法^[6],这可能会使得意识形态网络舆情的研究成果缺乏实证支撑,不能够与时俱进地指导意识形态领域的实践工作。

本文采用舆情研究中常用的社会网络方法对意识形态网络舆情进行研究,抽取网络密度、平均最短路径、聚类系数、节点中心度、凝聚子群等指标,来表征意识形态舆情的网络结构与网络位置,从而定位该网络中的意见领袖和相关核心子群,对意识形态网络舆情展开总体、细致的分析和判断。

一、意识形态网络舆情的研究设计

微博的高速发展给予了网民更多的发声机会,也为持不同意见、观点的网民提供了争论的场所,网络论战屡见不鲜。微博兴起之前,各类意见的支持群体也时常就社会热点问题争论不休,但这些争论大多止于立场隐晦的文字博弈。随着共青团中央的一篇文章《信仰》的发布,意识形态的网络争论一触即发(下简称为“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论战事件)。在该论战事件中,论战双方摒弃了过去“指桑骂槐”的方式,在微博上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各自立场。网民也通过公开站队的方式加入其中,两派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已充分地暴露在公众视野下。此次论战事件被业界媒体和政界视为由于外来文化入侵所致的西方意识形态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派别斗争的一个缩影^[7],具有意识形态斗争的典型性,揭示着意识形态斗争开始从隐晦走向明朗。也鉴于此,本文选择“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论战事件为研究案例。

“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论战起源于2015年9月21日共青团中央官方发布的一条微博。当日上午10点左右,共青团中央官博发布题为《信仰》的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对于我们共青团人来说,共产主义既是最高理想,也是实现过程”,并发起“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话题讨论。不久,知名地产商,也是微博大V@任志强微博转发并评论道:“曾经被这个口号骗了十几年!”此语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众多网友的激烈讨论,逐渐形成了以各级共青团组织为代表的团委官方微博以及司马平邦、地瓜熊老六、陆天明等网络大V为首的共青团阵营和以@任志强、@徐昕、@刘胜军改革、@袁裕来律师、@崔小平律师等为代表的社会公知所形成的任志强阵营。共青团阵营转发了任志强2013年10月31日接受南方周末采访的新闻稿,标题为《任志强:我信仰共产主义,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社会》一文,公开质疑之。至此,双方阵营论战持续发酵,事件相关话题在新浪微博上的转发量与评论量均破万条,成为微博热门话题,最终此事以任志强被封号宣告结束。

本文基于新浪微博平台,围绕“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论战对相关热门主题帖进行搜索和数据采集,将事件主要方任志强发表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原创微博与共青团两日后对其作出的回应微博《与任志强先生榷》作为原始帖进行数据搜索。鉴于微博平台的 API 隐私设置较高^[8],本文依靠手工方式获取转发数据,将微博用户对话题相关贴的转发行为视为其最直接的信息传播行为,构建二元有向传播网络。

二、意识形态网络舆情研究的实证分析

(一) 网络基本结构特征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一般先构建网络结构图,采用网络密度、聚类系数、评价最短路径 3 个指标表征网络基本结构特征。网络构图中,箭头指向关系接受者,若节点之间不存在转发关系,则对应边的取值为 0,反之,取值为 1。据此,本文构建出如图 1 所示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论战事件舆情网络图,在该舆情图中,共有节点数 490 个,节点间实际连接数 867 条。经计算,网络密度为 0.036,聚类系数为 0.045,平均最短路径为 8.396。结果表明,在此次“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论战事件舆情网络中,网络密度较低,网络内部节点间的信息交流和互动并不频繁,且涉及范围狭窄,节点间紧密程度不高,集团化程度较低,凝聚力不强。虽然网络的高速发展极大地降低了网民参与话题讨论的门槛,但在“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论战舆情网络图中,核心节点依然较明显,表明该话题并未在更多的社会阶层间扩散,仍局限于事件相关方及各自支持者群体内,论战话题的敏感性和信息传播的多层级性更是大大削弱了节点间信息的沟通能力。因此,该事件并未在普通网民中获得关注和重视。总体而言,此次事件舆情网络具有密度稀疏、黏性弱、凝聚力不强的基本结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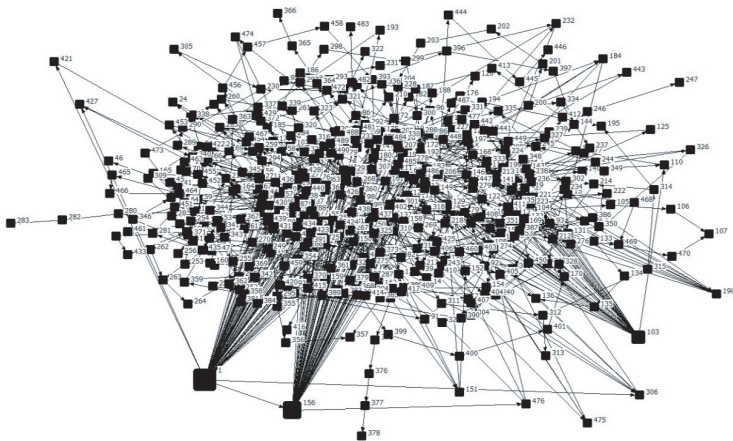


图 1 “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论战事件舆情网络图

(二) 中心性分析

中心性分析主要包括点度中心度、介数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三个方面。点度中心度基于网络活动角度,可以较好地衡量节点的交往能力,分为入度中心度和出度中心度,分别表示信息从节点的进入和发出情况,表明该节点在网络中扮演着信息接受者或信息发送者的角色。中间中

心度是衡量节点对信息资源控制能力的测量指标,在网络中起到桥梁作用。接近中心度则关注信息传播路径而非直接关系,若某一节点仅需经过较短的路径就可与其他节点进行信息联系,则节点的接近中心度值较小,不受其他节点控制的能力较强,具有较高的独立性,居于网络的核心位置。具体中心度测度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论战事件舆情网络的节点中心度测度结果

点度中心度				接近中心度		介数中心度	
入度中心度		出度中心度					
节点	数值	节点	数值	节点	数值	节点	数值
崔小平律师	19	共青团中央	69	共青团中央	0.388 40	共青团中央	0.375 44
陈业文新大都	9	任志强	56	任志强	0.377 90	任志强	0.308 38
司马平邦	7	徐昕	36	共青湖南	0.338 88	徐昕	0.155 05
平民王小石	6	共青团中央学校部	30	演员孙海英	0.325 35	共青湖南	0.124 42
侯宁	6	共青湖南	26	王祖哲	0.321 29	共青团中央学校部	0.116 10
点子正	6	地瓜熊老六	17	荣剑 2001	0.319 82	崔小平律师	0.068 18
中国公知精神病总院	6	吴法天	13	偃月刀之舞	0.319 82	演员孙海英	0.045 53
陈光武律师	7	陆天明	12	赵克罗	0.319 19	地瓜熊老六	0.041 95
侠骨柔情的杨华	6	MRneoanderson	10	无畏高尔察克	0.319 19	荣剑 2001	0.036 89
后余万凯	6	杜建国微博	10	徐昕	0.317 53	刘胜军改革	0.036 42
均值	1.769		1.769		0.241 56		0.006 68

在表 1 的点度中心度测度结果中,“共青团中央”和“任志强”作为此次论战的发起人,分别以 69 和 56 的数值在出度中心度上排名第一和第二,标志着他们作为原博节点所发出的信息量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对比出、入度中心度前十的节点,在入度中心度前十位节点中,包含司马平邦在内的共青团方和包含崔小平律师在内的任志强方,双方各占一半。而在出度中心度上,共青团则在十个节点中占据了八个。这主要是因为共青团方多采用发布原创微博、转发相关回帖的方式进行论战,他们结合自身“加 V”认证的权威性和源头博主的网络影响力展开论战的方式在信息发出上占有极大优势。而任志强一方,除了原博“任志强”的原创发帖之外,其他节点的论战方式主要为转发。此外,出度排名前十的节点并未在入度前十节点中出现,入度前十节点也未在出度前十中出现,这表明双方在论战时,信息的流向呈单向性,信息发出者与信息接收者之间并未存在太多的双向信息交流。

在接近中心度测度结果中,由于任志强方多采用转发方式开展论战,即在接收到共青团方的信息后通过多转发的方式进行回击,信息传播路径广,节点独立性较强,因此在前十节点中占据大多数位置。而在介数中心度测度结果中,前十节点均值不高,为 0.006 68。但各节点间数值差距相对较大,最大值节点为“共青团中央”,数值为 0.375 44,最小值节点“刘胜军改革”仅为 0.036 42。介数中心度是节点控制信息资料能力高低的体现^[9]。前十节点数值差距较大的数据

结果表明,舆情网络中节点的信息控制能力差异较大,个别控制能力较强节点的信息的处理方式和行为对整个舆情网络信息传递和扩散的路径和效率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总体而言,此次论战舆情中,“共青团中央”一方的论战方式主要为原创发布和转发,而“任志强”一方则以转发为主,作为原博的“共青团中央”和“任志强”与其他节点间的信息传递方向单一,与其他节点并无过多的双向信息交流,舆情图中各节点对信息资源的控制能力各异。除了“共青团中央”和“任志强”两个原博节点外,还存在着许多网络大 V,他们凭借自身的知名度和庞大的粉丝数,对舆情的发展方向、蔓延态势产生着显著的影响。

(三)块模型分析

块分析是从关系的角度对网络整体特征进行研究的一种方法^[10]。该理论认为,网络中的某些节点间所存在的共性是由于其所处的网络位置相似,与该节点是否具有这种个体特征无关^[11]。块模型分析通常以某种规则(如合同关系、亲属关系)为依据,若节点间的关系符合这一规则,则将其划分为同一块(即同一网络位置)。由于同一块内的节点在该规则上具有相似特征,分析时只需取其中的一个代替所有个体进行研究,从而将庞大复杂的网络转化为简单网络,也大大减少了研究所需工作量^[12]。本文依次按照行动者分区、各块取值确定(α -密度标准)两个步骤对此次论战的舆情网络展开块模型分析,基于转发关系,得到了 8 个相对集中的模块,表 2 展示了这 8 个模块的代表性构成。

表 2 “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论战事件舆情网络块分组情况

组别	块分组主要代表性构成
块 1	共青团中央、共青团中央学校部、椒江叶 sir、子午侠士、陆天明、老辣陈香、李仲伟律师、李英俊律师等该块内共 42 个节点,仅有 5 对节点存在联系
块 2	平民王小石、吴法天、思想火炬、如皋老猫、819 评论团、尹国明等 27 个节点
块 3	多数为转发共青团中央的微博节点,包含河南共青团、点子正、共青团福建省委、江西共青团、司马平邦、青春湖北、山西共青团、紫光阁、共青团景临、西藏共青团、共青团河南省委学校部等 66 个节点
块 4	任志强、共青团湖南、地瓜熊老六 3 个节点
块 5	大多为转发块 1 中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块 4 中共青团湖南的节点,如假行僧老巩、罗亚蒙、叶语在江南、胡杨麟、吴其伦、义勇军召集人、首都在线等。此外,还有少数节点与块 3 和块 7 内的节点存在信息连结。该块共有 49 个节点
块 6	184 个节点
块 7	块内的 79 个节点大多转发块 4 中任志强发布的微博信息,如洪晃 ilook、陈业文新大都、大众网朱德泉、刘胜军改革、浩正刘臻、刘春、老徐时评等
块 8	40 个节点

如表 2 所示,块 1 和块 4 分别为论战发起方“共青团中央”和“任志强”的节点模块,块 2 和块 7 因对论战发起方原微博实行了转发行为而分别独立成块,且块内节点数量较大,这从侧面说明了作为论战发起方的“共青团中央”和“任志强”在舆情的传播和扩散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巨大影响。8 个模块规模也各不相同,最大的块 6 达到了 184 个节点,最小的块 8 只有 40 个节点。块 3 则是与共青团中央在组织上具有重要关系和密切联系的节点聚集地。经密度计算,本文得

到了表 3 所示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论战事件舆情网络的密度矩阵。

表 3 “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论战事件舆情网络密度矩阵

	块 1	块 2	块 3	块 4	块 5	块 6	块 7	块 8
块 1	0.000	0.016	0.026	0.024	0.009	0.002	0.001	0.000
块 2	0.004	0.006	0.000	0.000	0.000	0.001	0.000	0.001
块 3	0.004	0.006	0.002	0.006	0.002	0.002	0.001	0.002
块 4	0.008	0.051	0.032	0.167	0.119	0.000	0.333	0.017
块 5	0.002	0.000	0.001	0.007	0.000	0.002	0.002	0.001
块 6	0.001	0.000	0.000	0.001	0.001	0.001	0.001	0.002
块 7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0.002	0.001	0.003
块 8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002	0.002	0.003

由表 3 可看出,在块内节点方面,块 4 内部密度最大,为 0.167,说明块 4 内虽然只有任志强、共青湖南、地瓜熊老六 3 个节点,但各节点内联系密切,凝聚力、行动力强;在块间联系上,块 4 与块 7 密度最大,达到了 0.333,说明除单纯的转发行为外,块 7 内的大部分节点与块 4 节点存在着较频繁的信息交流。为了使块间信息交流关系更直观、清晰,本文对表 3 矩阵做了二值化处理,以 0.003 6 的网络密度值作为临界值,对表 3 数值进行了矩阵转化,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论战事件舆情网络像矩阵

	块 1	块 2	块 3	块 4	块 5	块 6	块 7	块 8
块 1	0	1	1	1	1	0	0	0
块 2	1	1	0	0	0	0	0	0
块 3	1	1	0	1	0	0	0	0
块 4	1	1	1	1	1	0	1	1
块 5	0	0	0	1	0	0	0	0
块 6	0	0	0	0	0	0	0	0
块 7	0	0	0	0	0	0	0	0
块 8	0	0	0	0	0	0	0	0

表 4 展示了此次论战各块的像矩阵。观察表中数值,可发现在出入度关系上,块 6 出、入度均为 0,块 7、块 8 出度为 0,入度不为 0,其余块在出度和入度上均不为 0。出入度关系表示了块是否存在信息的发出和接收行为,因此,可以根据出入度关系,从信息收发角度将此次论战舆情网络块分为传播者、接收者和孤立者三类。传播者在该论战事件主要通过转发、评论的方式进行信息的发出和接收,即块 1、块 2、块 3、块 4、块 5;接收者主要通过对其他块内节点发布的信息进行原文转发的方式发挥着信息的接收作用,如块 7、块 8;孤立者与其他两类不存在块间联系,信息交流和交换大多在块内完成,如块 6。传播者对论战舆情的传播和扩散发挥着重要作用,是论战舆情网络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所在;接收者对传播者发出的信息作出响应,但对舆情传播范围的

扩大并无明显作用;孤立者在舆情内活跃程度较低。依据三者特性,本文绘制了此次论战舆情块的像矩阵简化图,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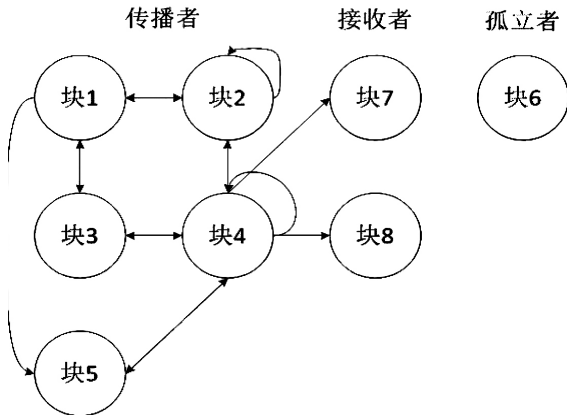


图 2 “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论战事件舆情网络像矩阵的简化图

由上图可知,此次论战舆情网络存在孤立块(块 6),属于非连通网络,该舆情网络内存在明显的等级结构。块模型较为清晰地描绘出此次论战舆情网络的整体结构,但仅基于节点位置及节点间多维关系的划分可能会导致分析结论不完全,因此,有必要结合节点的社会属性对该舆情网络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四)子群结构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具有对关系的突出表达优势,既可以将网络视为一个整体又可视之为整体网络的各个组成部分,从而体现出网络的整体性和层次性特点^[13]。由意识形态论战所引起的网络舆情在其传播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众多不一致的意见,这是不同社会群体间社会利益和社会属性存在差异的体现。但在对舆情网络进行相关划分(如块模型划分)时,往往容易忽略这些差异的存在,仅根据各网络节点间的关系特征对舆情网络进行划分。在意识形态论战所形成的舆情意见环境中,相异观点间往往容易因意见相悖而相互排斥,而相同意见间则更可能呈现出凝聚、集中的趋势^[14],信息的交换与交流也可能更为紧密,因此,根据意向、态度等对网络进行划分可能更符合舆情传播的实际。本文将此次“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论战事件舆情网络的节点划分为两大类,即共青团方和任志强方,分别对应共青团子群网络和任志强子群网络。表 5 显示了共青团子群网络、任志强子群网络和整体网络的网络整体结构对比结果。

表 5 “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论战事件舆情子群网络整体结构对比

指标	共青团方子群网络	任志强方子群网络	整体网络
网络规模	180	310	490
网络密度	0.008 9	0.004 5	0.003 6
平均最短路径	4.497	5.088	8.396
不可达节点的数量	9	8	0
聚类系数	0.065	0.041	0.027

结合表5中网络密度、平均最短路径和聚类系数三项的对比结果可知,共青团方子群网络较任志强方子群网络更为紧密,说明该子群内部节点间交流和联系更为密切、频繁,且节点间信息传递路径较短,传递速度较高。在不可达节点的数量方面,共青团方不可达节点数大于任志强方,这可能是由于任志强方具有较大的网络规模,而网络规模的扩大带来了网络内部连通性的提高。就子群网络和整体网络的各项数据对比结果而言,整体网络在网络密度、聚类系数上远低于子群网络,平均路径上则大于子群网络,这表明了子群网络较整体网络内部凝聚性高,信息传递速度快。但在不可达节点方面,整体网络为0,子群不为0,表明了各子群间仍存在着信息联系,虽然这些联系并不明显。总体而言,此次论战舆情网络中,存在着共青团方和任志强方两大子群,各子群较整体网络规模较小,但网络聚合度高,信息传递速率快,内部节点联系紧密,强连接关系特征明显,各子群间互动并不频繁,呈弱关系连接。

三、意识形态网络舆情研究的结论与启示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已向网络空间蔓延。本文运用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对爆发于网络空间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论战事件展开了研究,从网络基本结构特征、中心性、块模型和子群结构四个方面对该事件所引发的舆情网络结构进行了探讨。

首先,意识形态舆情传播主体间关系呈现精英特征。在“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论战事件舆情中存在少数核心节点扮演意见领袖角色。这些节点的信息传播优势主要源于他们与意识形态问题存在紧密的关联,其对意识形态问题关注度较高,吸引了大量具有共同关注点的微博用户,如共青团中央、任志强、徐昕、点子正、地瓜熊老六等网络大V。这些意见领袖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信息传播速度、范围,以及公众的舆论倾向。

尽管互联网的出现大大提高了网民的话语权,创造了“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舆论繁荣”景象^[15],但当前的舆论发展趋势表明意见领袖的话题主导地位仍十分突出。尽管在国家依法治网、依法办网的大环境下,部分“意见领袖”的不当言行正日益边缘化,但网络媒体的高度开放性、传播快捷性和影响范围广域性等特点削弱了网民辨别信息真实性和有效性的能力,使得“意见领袖”的言论仍对舆情风向的导向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促使舆论高度活跃和流动性过剩、非理性诉求的表达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16]。由于网络舆情与社会文化形态息息相关,意识形态建设又关乎国家思想政治稳定,若不对其进行正确的引导,任其过度发展,一旦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则极易引发社会意识形态危机,危及国家政权的稳定。因此,在意识形态舆情的管控工作上,要充分利用“意见领袖”的双重作用。一方面,“意见领袖”清晰地展现了当前舆情网络的发展方向 and 舆论状态,是舆情网络的风向标,可以通过对“意见领袖”活动的监控实现对舆情发展现状的把握和发展趋势的预测;另一方面,要重视与利用“意见领袖”的影响力,通过恰当的管理技术和管理策略对其进行指导,防止舆论“脱轨”“越轨”的发生。

其次,“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论战舆情网络中存在具有明显等级关系的若干子群。这些子群在舆情传播过程中分别充当着传播者、接收者、孤立者的角色。相对于其他舆情事件,“共产

主义事业接班人”论战事件孤立者子群特征明显。

在当今公共事务讨论中,越来越多的人只通过浏览的方式表明自身态度的“中立”,导致了孤立者子群的出现。这种“只看不发”的表达方式是网民对自我态度表达的一种权宜性、主观性和片面性的选择,是网民主流政治活动参与兴趣降低、政治社会化功能缺失的一种体现。而正是在这一次次的“只看不发”中,公民或许正将自身态度的表达权利让渡于意见领袖,逐步成为舆论漩涡中的“沉默者”,随意见领袖的“波涛”而动^[17]。因此,在应对意识形态网络舆情时,不仅要监测意见领袖的意识形态交锋,也应兼顾孤立子群,即应注重提高普通网民独立思考、仔细甄别、认真判断的能力,引导网民做出正确的个性化政治表达。

最后,在此次意识形态舆情论战中,群体极化现象突出。持相同观点态度的节点更容易聚集成小团体,形成强连接关系。网络空间促使了人们信息获取能力和传播能力的空前提高,个性化、小众化意识的加强使得持相似观点的网民群体聚合性较高,极易形成意见鲜明、观点对立的阵营团体。这种“茧房化”^[18]的发展趋势,在削弱异观点群体间的沟通交流、相互认同的同时,加剧了同观点群体内部思想的随波逐流和情感表达的情绪化。若其反作用于当前我国社会两极分化的客观现实中,很容易为民粹主义思潮的流行提供机会。民粹主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民意的走向和波动,是社会弱势群体发声的有力渠道^[19],但是其所具有的冲动、暴戾和感性特点使得其所发诉求往往带着过多的非理性感情色彩,这种感情色彩若经由网络舆情的调拨会对社会某些黑暗面进行放大,导致谣言盛行,严重时甚至会干扰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危及国家政权的稳定。因此,如何避免意识形态网络舆情发展过程中群体过度极化,科学抒发和缓解情绪应是意识形态网络舆情应对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由于本文实证研究案例局限于个案,所取得的研究结论可能并不一定适用于一般网络结构特征的研究,对意识形态不同发展阶段舆情网络可能表现出不同特征也尚未进行论证,这将是后续研究的主要方向。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 朱国伟,余双好. 意识形态网络舆情:一项多案例研究[J]. 思想理论教育,2015(7):61-67.
- [3] 张宽裕,丁振国. 论网络意识形态及其特征[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8(2):37-38.
- [4] 聂筱渝. 西方的控制操纵与中国的突围破局——基于全媒体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的审视[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4(3):69-83.
- [5] 顾东晓,张悦,顾佐佐,等. 基于期望确认理论的社交网络正向舆情信息传播模型研究[J]. 情报科学,2016(4):29-34,39.
- [6] CACCIATORE M A, MENG J, BOYD B, et al. Political ideology, media-source preferences, and messaging strategies: a global perspective on trust building[J].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2016(8):23-24.
- [7] 朱东来. 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斗争的特征分析[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5(1):38-40.
- [8] 曹玖新,吴江林,石伟,等. 新浪微博网信息传播分析与预测[J]. 计算机学报,2014(4):779-790.

- [9] SEMRAOZDEMIR F, JOHNSON R, WHITTINGTON D. Public goods and welfare valuation; an experiment on allocating government budgets[J]. *Journal of Choice Modelling*, 2016(8): 101 – 102.
- [10] 徐莹, 徐峰. 基于块模型的大学生学习网络子群研究[J]. *现代教育技术*, 2015(6): 96 – 101.
- [11] 仪建红, 王欢. 基于块模型的微信用户关系网络分析[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5(6): 18 – 23.
- [12] 孟永伟, 王晓英, 沈茜, 等. 基于三角形演化机制的社会网络模型研究[J].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 2016(8): 111 – 114.
- [13] 潘峰华, 赖志勇, 葛岳静. 经贸视角下中国周边地缘环境分析——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J]. *地理研究*, 2015(4): 775 – 786.
- [14] FINLAYSON J G. The theory of ideology and the ideology of theory: habermas contra adorno[J].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003(8): 112 – 113.
- [15] 赵惜群, 黄蓉. 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长效机制的构建[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6): 59 – 63.
- [16] 张波, 邓卓明, 邹莉. 意识形态话语权: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挑战及路径[J]. *思想教育研究*, 2015(1): 36 – 39.
- [17] 黄丽萍. 网络舆论场中党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J]. *浙江社会科学*, 2016(9): 102 – 107, 159.
- [18] 方付建.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演变研究[D].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11.
- [19] 陈建波, 庄前生. 论牢牢把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6(1): 112 – 118.

(责任编辑: 刘 云)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of the Internet public opinions on ideology: a case study on the debate over Successors to the Cause of Communism

HONG Xiaojuan^{1,2}, LIU Lu¹, HUANG Weidong^{1,2}, YE Meilan^{2,3}

1. School of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210023,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of Modern Information Service Industry of Jiangsu,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210023, China
3. President's Office,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cheng 224001, China

Abstract: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on ideology is a symbol that ideological struggle has spread to the cyberspace. With the example of the debate event over Successors to the Cause of Communism in 2015,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is employed to explore the network struc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in its spread from four levels, including the basic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centrality, block model, and sub-network. The case study indicates that, (1)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on ideology has an obvious characteristic of “opinion leader” in its spread; (2) there are several subgroups with obvious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s in the network; (3) a serious polarization exists in the internal group, which makes the network a hotbed for the breeding of populism.

Key words: ideology;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